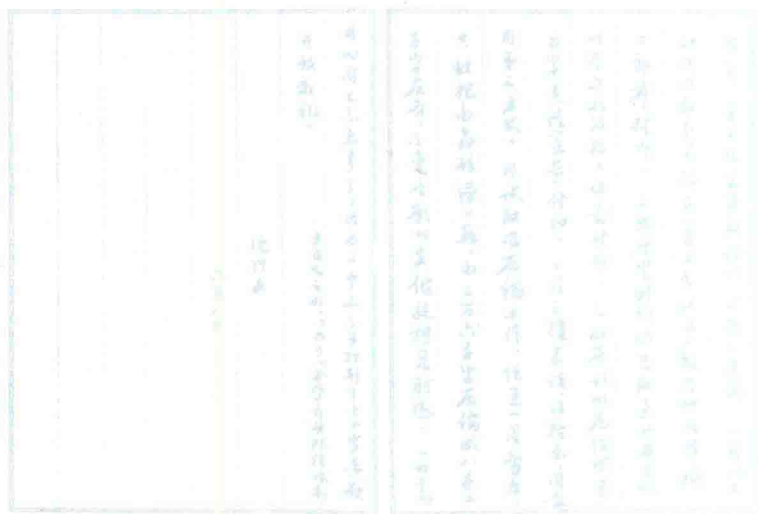


丽泽人文
学术书系

沈从文小说的 民族国家想象研究

吴翔宇◎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丽泽人文学学术书系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项目（2016QN026）最终成果

沈从文小说的民族国家想象研究

吴翔宇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小说的民族国家想象研究/吴翔宇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丽泽人文学术书系）

ISBN 978 - 7 - 100 - 15822 - 0

I. ①沈… II. ①吴…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3276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丽泽人文学术书系

沈从文小说的民族国家想象研究

吴翔宇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5822 - 0

2018年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68.00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国家表述与沈从文现代意识的生成.....	26
第一节 错位身份的反观与“中国想象”指符	26
第二节 “百年立国”与文学经典的追寻	39
第二章 “神一人”权力谱系：乡土中国的形象学体系.....	53
第一节 身体隐喻与乡土中国的“反阉寺”强力	53
第二节 自然精神与乡土中国的“崇神性”伦理	66
第三章 乡土中国之“常”：“爱”与“美”的自然乐章.....	76
第一节 爱的生命原力与民族“主体性”的重建	76
第二节 爱与死相邻：与自然契合的人伦生态	89
第四章 乡土中国之“变”：从“神在生命”到“神之解体”.....	103
第一节 “他者”的闯入与“自我”的文化隐痛	104

第二节 “镜像”的去魅：“生命”转向“生活”	121
第五章 “向未来凝眸”：现代中国的思想重造	135
第一节 “新抽象原则”：重建理想健康的人格模态	136
第二节 “清洁运动”：现代性自反特质的超越	150
第六章 现代性认识装置下乡土中国的精神表征	164
第一节 “静态”时间隐喻与农业文明的挽歌	164
第二节 “互文”空间隐喻与城乡文化的共鉴	175
第七章 文学与政治结缘：“民族政治”的析离与聚合	191
第一节 “人事”“梦”的平衡与失衡	191
第二节 “政治无信仰”与沈从文的“重造政治”	212
第八章 新人想象：民族新生的话语实践	223
第一节 人类“童年期”遐想与社会化忧思	223
第二节 “用天真打量沉重”：儿童文学改编的本土立场	245
结 语	254
参考文献	265
后 记	271

绪 论

自沈从文的作品问世后，对沈从文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将沈从文界定为一位“乡土作家”。^①此后，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巴人、苏雪林、刘西渭、贺玉波、凡容、李同愈、林默涵等人从不同领域、角度和层面对沈从文进行过研究。这其中，除了苏雪林和刘西渭对沈从文评价颇高外，其他同时代的批评家对其批判的声音居多，其中夹杂着政治、党派和阶级等之类的因素，缺乏客观公允，对沈从文贬多扬少。对于自己创作的际遇，沈从文似有自知之明，他这样回忆道：“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②20世纪90年代以后，沈从文研究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于沈从文精神资源的探究也呈现出超越简单化的政治阐释局限的态势，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然而，就沈从文的民族国家想象实践而论，很多研究者意识到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开启民族国家想象的主体塑造工程，体现了其独特的现代性价值。这与现代中国艰难的现代危机及弃旧纳新的转型背景密切相关。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在对中国社会强烈的劣败感受中，一些思想先觉者开始探求走出当时困境的未来之路。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实践也随之开启。围绕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展开的思考体现了现代知识分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②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子清醒的国家意识，为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野和思维背景。民族国家重构了中国人关于自我与世界秩序的印象，构筑了中国新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是我们考察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

应该说，国内外学者对沈从文的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和缺憾，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探究。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其一，意识到沈从文中国想象的“反现代性”特征，但对于沈从文重建民族人格、改造社会以及向未来凝眸等重要观念缺乏全面而深刻的梳理和确认。沈从文的中国想象有效地整合了“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的内涵，关注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生活“横截面”的丰沛内容及民族心灵纵向演进的轨迹。这其中既有恢宏的历史政治事件，又有世俗的人生百态。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国人的精神气度、生存状态渗透于微观和宏观的视域中予以观照，呈现出国人共有的民族文化心理、民族心灵创伤以及民族精神。这其中，《边城》等乡土抒情小说和《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呈现出关于“乡土中国”的不同形态。与前者更多地呈示诗意的乡土中国形象不同，后者似乎有意避开这种抽象抒情的笔调，更多地呈现出现实湘西的样貌，即凌宇所说的“沈从文意识到写作这两本书的责任——向湘西以外的人们报告湘西的实情”^①。因而，一面是充满抽象抒情的诗化乡土；另一面则是真实湘西的再现，两者构成一种相互拆解又融通的关系。当然，沈从文散文所呈示的乡土中国也渗透了“抒情幻想成分”。1934 年和 1938 年，沈从文两次回湘西，而后写出的还乡散文显然有作家对于湘西实地考察后的“现实的震撼”，但也浸润了其一贯的抒情氛围。关于这一点，以往的沈从文散文研究中，很多学者虽也提到“抒情”，但基本上都是将其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和风格上的抒情特色，并未紧扣沈从文乡土散文内核，这显然是有缺憾的。不管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学者所谓的“抒情传统”是否存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抒情”这一观念的含义应该更丰富，绝不是仅仅限于一个文体、文类，

^①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岳麓书社 2006 年版，第 366 页。

它可能包括作者的理想、价值观,甚至“意识形态”,以及作者是如何表达这些“意识”的。由此,沈从文的中国想象也必定在一个充满动态的形象结构中穿梭,呈现出立体而多元的乡土抒情的意绪。

其二,认识到了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中西、古今对接等问题,但对于两者之间是如何冲突与互动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思考。沈从文构建中国形象的文学实践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以往的研究多关注沈从文“乡土中国”形象的审美维度,而对于沈从文开启主体形象建构的“背景”(时机)、“契机”(机制)、“焦虑”(问题)等理论层面的综合还较为薄弱。沈从文的中国想象正是基于中西文化碰撞而产生的,有着民族身份焦虑心理的驱动,他从自身文化血液中找寻本土文化的基因,构建了有别于外国人的“他塑”中国形象,其“自塑”的话语实践是确立中国形象建构主体性的重要保障,有效地扭转了“他塑”中存在的误读、曲解的现象,还原了中国形象该有的本土文化立场和实践路径。与此同时,沈从文的中国想象也丰富了中国作家构建国家形象的内涵,尤其是沈从文诗化中国形象的倾向在催生、引导和凝聚国民精神方面起到了对内文化整合的功能。毋庸置疑,国家形象的主体性与国家形象价值的主体性既有共通性又有差异性。确立了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后,国家形象价值的主体性才能更好地得以确立。沈从文“自塑”中国形象有助于消除“他者化”“异质化”的“他塑”实践,避免误入由某种意识形态或中心话语所制导的形象体系之中。

从学理上来看,作家的民族国家想象紧扣“中国”这一核心要素,用文字的表意来呈现现代中国纷繁复杂的演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人,现实、历史与文化等要素连接在一起,形构了饱含中国特质的文学形象,而这一形象既是历史的,也是审美的,“它是想象的,也是现实的,在真实与虚构的张力关系中展现中国的多样化面貌”^①。不言而喻,文学视域中的中国想象离不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缘起、生成与演变,也无法离弃作家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与体验,由此开启的文学实践自然就与其所置身的中国情境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① 徐放鸣:《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江海学刊》2013年第4期。

人类对风景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是文明史的一部分,风景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性的文化和审美的问题。在美国学者米切尔看来,“我们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subjective identities)通过这个过程形成”^①。这样一来,风景就由一个“名词”转变为“动词”。对于“乡土”这一风景而言,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不仅要带领读者去“看”和“领略”其熟悉的故土,而且还要通过这种沉思性的观看来照见其主体性的发明。前者视觉性的风景表呈和后者主体性的文化建构构成了沈从文对乡土风景发现的主体内容。当然,想要实现对乡土风景的发现,必须要有作为内在于乡土情境的人才能真正感知,同时又要跳出乡土自足圈子的“外在人”的凝视。即是说,只有兼具“内在人”(insider)和“外在人”(outsider)的双重要素才能对于乡土风景有理性而客观的发现。缺失了前者就无法真正进入乡土,而缺失了后者则无法跳出乡土。从这种意义上说,沈从文“寓居于都市的乡下人”的身份定位是完全符合发现乡土风景的条件。

对于沈从文而言,“发现”乡土风景意味着祛除他人对于乡土认知的偏狭。这主要表现在:本地人对乡土的漠视与不关心,外面人对乡土“异托邦”式的误读^②。沈从文两次“返乡”经历为其乡土风景的发现提供了条件。在沈从文的意识之中有一个“原乡”,它支撑着作家用温情的笔调来诗意地怀想,为作家提供不可或缺的文化给养和精神资源。而正因为“生活在别处”,寓居于都市的沈从文不得不以“回归”的姿态去冥想在现实中缺失的家园,这样一来,“还乡”书写也就成为沈从文重构理想精神家园的具体表征。在沈从文这里,“还乡”有两层含义:一是记忆深处的乡土情结,通过回忆性的表述来慰藉作家的思乡、恋乡之情。二是身体力行地从城市回归乡村,通过自己的见闻来与自己记忆中的乡村比照。可以说,沈从文建构和发明的这种精神原乡是一个与现实生活相异的文化板块,“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与参照是沈从文还乡书写必不可少的叙事结构。对此,王德威指出隐藏于沈从文内心深处的乡土冲动:“沈从文的重游故地,无论是真实的还是

① [美] W. J. T. 米切尔:《风景与权力》,万信琼、杨丽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② 张箭飞:《风景感知和视角——论沈从文的湘西风景》,《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文本的，必将暴露其想象的根源。”^①在回忆与现实两条线索的交互网络中，我们能发现沈从文或因身份、地位、阅历的变化或因时代变动等因素而造成的还乡心态、还乡视角的变化，而这变化的河床之下，潜隐的是沈从文对城市的态度的变化，是“乡下人”身份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入，是沈从文城乡对立思维模式的慢慢明晰、成熟和成型，以及沈从文从一个“造梦”的写作者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蜕变。

尽管沈从文将其文学创作视为“梦梦”，但他始终没有离弃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和体悟，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现实生活的刺激，他对于乡土、民族及国人的理解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都无法达至更深层次的体悟。对于这个问题，王晓明就曾敏锐地指出：“当沈从文在北京开始创作时，首先触动他的不是诗情而是一些很世俗的感情。”^②对于沈从文而言，城市是其谋生与文学生产之所，但也给这个“乡下人”带来过诸多困扰和反感，换言之，对于“城市文化圈”的厌弃强化了其对于文化原乡中理想的人事的记忆，而这种召唤出来的记忆与现实生活的经验融为一体，生成出可供反应参照的文化系统。在这个“都市文化圈”里，“教授”“绅士”和“大学生”构成了常人钦羡的精英阶层，然而，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却对其“不能引起多少兴味”。恰恰相反，他却对那些看似低贱的乡民多有好感，“到他们身边时，我们谈到的问题，实在就比我到一个学生身边时可谈的更多……若同一个大学教授谈话，他除了说从书本上学来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说从报纸上学来的他那一分感想”^③。这种爱憎是沈从文身份观念的反映，也驱使其跳出都市那种严肃的人际圈子及教育环境，转而去怀想“自然”这本人生大书。在他的文章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情感倾向：“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④在这里，社会是一本“大书”，而占

①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页。

② 王晓明：《“乡下人”文体与“土绅士”的思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本》，刘洪涛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4页。

③ 沈从文：《常德》，《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页。

④ 沈从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1页。

据了这本“大书”主体位置的则是观照现实生活的人生姿态。这种来自“童年”的文化记忆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沈从文的思维深处，当他进入都市后，乡下人难以融入社会的自卑感被凸显出来，一种因陌生而显得格格不入的状态占满了沈从文的内心，“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①。在北京生活了几年的他依然无法真正容身于都市文化圈，这种隔绝的状态更多的不是来自他人“推搡”式的驱逐，而更是沈从文自我疏离的结果，其结果也只能是：“在北京文人集会上，他那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举止，在文人绅士中令人侧目而视。”^②

基于此，沈从文采用一种“‘求孤独’俨若即可得到对现象束缚的解放”^③的姿态来调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卑”和“自尊”相互作用，制导着沈从文对于现实世界的判断和思考，他起初对都市的“醋意”般的揶揄其实也内隐着其对于都市向往的本能，而当都市彻底撕裂了他保留理想的最后底线时，他的自卑激发了出于保护自尊的复仇心理。应该说，沈从文的乡土书写所预设的读者并不是乡下人，而是那些都市文化圈里的大学生、教授和知识分子。质言之，是都市生活激活了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在没来到都市之前，他的思维视域囿于乡土生活的经验之中，没有都市他者的烛照是不可能让其真正触发其内隐的乡土意识的。事实上，沈从文并非他所说的“乡巴佬”，而是一个生活在小城里的城镇人，他的家族也是当地较有声望的世家，“那时我家中每年还可收取租谷三百石左右，到秋收时，我便同叔父或其他年长亲戚，往二十里外的乡下去，监视佃夫督促临时雇来的工人割禾”。只不过后来家道中落，这种经历对其体悟乡土和乡下人的命运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现实生活的残酷并未完全剥夺沈从文的童年记忆，幼年心性自然的品格一直影响着沈从文小说的创作。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沈从文的叙述口吻也异样于乡民，他与那些纯粹的乡下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或者说，沈从文并不是乡土或乡下人的代言人，他更类似于一个往来于乡土与都市之间的“游走者”。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叙述：“学校有几个乡

① 沈从文：《一个转机》，《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页。

②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③ 沈从文：《由冰心到废名》，《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

下来的同学，身体壮大异常，便有人想出好主意，提议要这些乡下人装成马匹，让较小的同学跨到马背上去，同另一匹马上另一员勇将来作战”，“我常常设计把这些人马调度得十分如法，他们服从我的编排，比一匹真马还驯服规矩”。^①进入军队当兵后，很长时间的文书身份也让他与那些半军半匪的“大兵”有较大的隔膜，甚至他还觉得自己优于其他人。刚进部队，他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兵士可以自由外出，有的却不可以随便出入，“照我想来则大约系城里人可以外出，乡下人可以外出却不敢外出”。然而作者马上又写道，“我记得我的出门是不受任何限制的”^②。沈从文一方面以“乡下人”自居，另一方面在回忆中又“有意无意”地表明自己与一般“乡下人”身份的不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自觉疏离于城市文化圈的边缘，身份的认同危机驱使其置于一种焦虑和游离状态，陷入了自卑又自负的情绪旋涡。

正如英国学者西蒙·沙玛所说：“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③从一个带有地域印记的风景出发，可以观照这个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结构。沈从文的乡土书写既有对湘西自然风景的介绍，当然也不止于此，他要借湘西这一乡土风景来全方位地审思乡土中国的文化构成与现代走向。在沈从文这里，乡土风景的发现与民族性的发现具有同构性。沈从文秉持“有意来作乡巴佬”的真实意图来观照都市与乡村，这显然超越了单纯湘西风俗民情的展示，而开启了城乡参照的叙事方式，从民族精神重建的高度来讲述都市与乡村故事。作为一个都市的失意者，沈从文所能做的是用记忆之笔再现家园的温情，然而，“无法回家”的现实蚕食着其“期冀返家”的意绪，而这种眷恋与疏离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了其痛苦的心境。应该说，沈从文最初并不反感都市，抱着“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④的念头，

① 沈从文：《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大本书》，《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

② 沈从文：《辰州》，《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

③ [英]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④ 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页。

他离开了家来到北京。他原本希望到都市“来寻找理想，读点书”^①，然而现实的残酷逐渐吞噬着他朴素的文学理想，他无奈地接受了事实，文学创作成了他谋生的手段。

在外人看来，沈从文笔下的乡土风景具有某种陌生而神秘的意味。因而沈从文要对乡土进行“去魅”，这种“去魅”既是从内而外的凝视风景的过程，也是由外而内地审思自我以及隐藏在乡土风景背后的民族主体的过程。毕竟在乡土风景中表呈着当地人的生存方式、信仰与观念。在沈从文看来，乡土与都市的沦落和汉民族文化的根性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于是，他痛感这样的民族及文化无法真正抗御西方文化的侵蚀，如果不加以疗治，任其发展则后果不堪设想。在湘西时就没有受过正规中学教育的沈从文，到城市后更加觉得自己的卑微，想通过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地位却也落空，“为了生活不得不把写作作为取得独立的职业，他思想上还是念念不忘做学者”^②。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沈从文为什么很少写城市里那些地位不如自己的人，而反复揶揄教授、绅士、大学生们。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比他好，地位比他高，属于高高在上的绅士阶层，面对这样的群体，沈从文遭受巨大的精神压迫，内心有着难以言表的自卑感。因而，他在文中那种对大学生、教授、绅士等这类人的鄙夷态度只是表面的，其真实心理深层结构是：因向往而被拒绝，所以抗拒；因爱而不得，所以愤慨。

沈从文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使不认识我也给我一分尊敬？”强烈的自尊心从另一面激起沈从文的倔强和执拗，逼迫他不断努力，潜意识中总要和别人“比赛”，有一种超越他人的欲望，要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如此来平衡自卑感。在军队里，沈从文曾花了很多时间“发愤去写细字，一写便是半天”^③，他为自己的字深感自得，“我比他们字写得实在好些”，由于这个原因而受到赏识，做了书记员，“因此更努力写字”，每个月的薪水基本都用来买字帖。尤其当他的字为他赢得几句主任的赞美时，他更加勤奋努力，“就因为这类

①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

②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③ 沈从文：《女难》，《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页。

话语，常常可以从主任那瘪瘪口中听到，我于是当着众人业已熄灯上床时，还常常在一盏煤油灯下，很细心地用《曹娥碑》字体誊录一角公文或一份报告”^①。“我那时所需要的似乎只是上司方面认识我的长处”。沈从文对自己受到称赞总是念念不忘，后来在沅州，沈从文提到他的一个“有钱，有势”的当地的“大拇指人物”亲戚，“对于我的能力，也异常称赞”^②。越是自卑的人越渴望得到认可，沈从文的自卑，使他很看重别人尤其上司、上等人物对他的肯定和赏识。自卑的人最大特点是自我价值感不足，总是觉得自己能力不足，低人一等，需要别人的称赞和肯定来提升自我价值感。然而，正如斯图亚特所说：“我们当下不应该低估或忽视关于重新发现的本质身份的观念所导致的想象性重新发现行为的重要性。”^③为了消减自己作为边缘身份的自卑心理，沈从文有意识地从自己所经验的熟稔的文化基因中找寻可供弥补的有效质素，以此来对抗这种文化的重压。这种“重新发现”自我“本质身份”的过程意味着沈从文要打捞和开掘被都市文化遮蔽的乡土文化传统，要将这种乡土文化传统进行去蔽还原，这显然内合了沈从文关于民族文化重造的话语诉求，并扩充于中华民族整体性构想的宏大主题之中。

在《棉鞋》《松子君》《用A字记录下来的故事》《老实人》《公寓中》《善钟里的生活》《不死日记》《中年》等小说中，沈从文用自叙传的方式书写了“我”在都市中无所归依、精神漂泊的生存境遇。这其中既有在都市中卖文生存、朝不保夕生活的真实写照，持守着“一点愚人的真”^④以及“心性的不加雕琢的公布”^⑤，作家真实地控诉了病态都市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对知识者“我”的自我剖析则能窥见其深受郁达夫影响的印迹。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一文中，他声称郁达夫小说“给我们一个机会加以诚实的敬视”^⑥。在上述小说中，作家对“我”颓废的人生样态的展示是郁达夫式的，

① 沈从文：《保靖》，《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39页。

② 沈从文：《女难》，《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页。

③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④ 沈从文：《不死日记·献辞》，《沈从文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页。

⑤ 沈从文：《不死日记》，《沈从文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页。

⑥ 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不掩盖压抑的潜在意识和声音。对此,金介甫指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苦恼计有:性的饥渴、手淫、失眠、结核病、精神疲惫和偏执狂——就是说,郁达夫作品中人物的诸般杂症,除了赌钱、嫖妓、酗酒之外,在沈的作品里几乎照单全收。”^①

寓居在都市的沈从文始终不能忘怀自己的故乡,“我从二十岁起,先后转入几个大都市生活。经过整整半个世纪,表面上我仿佛完全变了,事实上却依然活在我顽童时代生活留给我的无比深刻的印象中”^②。在沈从文的其他作品中,“还乡”依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些多以第一人称抒怀的随笔散文,往往有一个思乡恋土的游子形象:《流光》中的“丧魂落魄似的东荡西荡”的“失了家的我”;《狂人书简》中的“人间摈弃者”;《怯步者笔记·鸡声》中的“空虚寂寞”的“客寓者”。这类怀乡散文遵循着较为相似的思乡抒怀模式:《流光》里由湘西一个亲戚“三表兄”寄来的一封信,让“我惘然想起了过去的事”^③;由北京听到鸡声想起乡下的鸡声,“我至少是有了两年以上没有听到过了”;因为夜间听到雨声和雷声,想起消失的岁月,于是“记起小时觉得有趣的端阳将临了”^④。这类作品往往以触景生情始,由“现在”联想到“过去”,然后采用古今对照的方式来感叹世事变迁、人事沉浮:“三年前的秋末”,“失了家的我”和三表兄同住“常德一个旅馆中”,那时虽也很穷困,但“那时的心情,比如今要快乐高兴得多了”^⑤。北京的火车汽笛声“若拿来同乡村中午鸡相互唱酬的叫声相比,给人的趣味,可又不相同了……这样的雨,在故乡说来是为划龙舟而落。若在故乡听着,将默默地数着雨点,为一年来老是卧在龙王庙仓房里那几只长而狭的木舟高兴,童心的欢悦,连梦也是甜蜜而舒适!北京没有一条小河,足供五月节龙舟竞赛,所以我觉得北京的端阳寂寞。既没有划龙舟的小河,为划龙舟而落的雨又这样

①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② 沈从文:《德译〈从文短篇小说集〉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页。

③ 沈从文:《流光》,《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④ 沈从文:《生之记录》,《沈从文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55页。

⑤ 沈从文:《流光》,《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落个不止，我于是又觉得这雨也落得异常寂寞无聊了”^①。与现代的境遇相比，沈从文毫无掩饰地流露出对故乡的思念和热爱。叙述主体多以“在故乡说来”“若在故乡”“且当作故乡”来行文开卷，言外之意，是自己已经不在故乡、不在家了。沈氏的思绪在过去与现在来回穿梭，当下现实景况的落魄沮丧，让其深陷无助的“不在家”的痛苦境地。

沈从文的“不在家”的感受并非是进入城市才有的，早在他离开本乡进入军队后就已经产生。常年的军队生活经历让沈从文目睹了愚蠢、残忍的争夺打杀，六年中眼见了上万无辜百姓被杀头的印象。这种灰暗、残忍、堕落的军队生活和压抑的社会环境，使沈从文恐惧、厌恶、痛恨，在精神上已经与家乡渐行渐远了，“我实在呆不下了，才跑出来！”^②于是他一心想离开半军半匪的部队，离开偏僻落后的湘西，想去另一个新鲜、文明、活力的世界寻点理想。然而到了北京后，身体上饥饿难耐，精神上遭受排挤和屈辱，城市生活让他无法适应，城市人对他的轻蔑与刻薄让他隐忍和自卑，这时候沈从文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失了家”的人。“我想，我是永远在大地上独行的一个人，没有家庭，缺少朋友，过去如此，未来还是如此。”^③“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养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好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④在身心都受到极大创伤后，内心长久的压抑、孤独、焦虑，使他急于倾诉和发泄，于是沈从文发现了湘西，思乡恋土的情绪油然而生，本能地有一种“还乡”的冲动。通过对童年趣事的甜蜜回忆，对家庭温馨生活的怀旧，对湘西美好乡村图景或家乡日常生活画面的赞美，唤起“在家”的强烈诉求，这种“在家”感主要体现在沈从文对身份的归属与认同感、自我价值的存在感和优越感。

身份的模糊与尴尬增加了沈从文的“不安全感”“无家感”。所以沈从文在以“乡下人”“乡巴佬”“乡下人气质”定位自己的同时，还塑造和赞美了很多淳朴善良、勇敢可爱的“我那地方的人”与“下等人”，比如纤夫、脚

① 沈从文：《生之记录》，《沈从文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55页。

②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

③ 沈从文：《Láomei, zuohen!》，《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④ 沈从文：《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夫、土匪、山民、马夫、染坊工人、木匠、制铁工人等等。在沈从文笔下，他们总是亲切、热情、智慧、勇敢的，让“我”喜欢靠近，我经常“出城到那些大场里去找染坊工人与马夫谈话”^①，“我常到修械处，我欢喜那几个小工人，我欢喜他们勇敢而又快乐的工作”^②。其实他偏爱和想念的这些人，无非都是“乡下人”的代名词，沈从文所言的“我那地方的人”“下等人”与“乡下人”是多位一体的。而且在作品中，作为当下作家的“我”经常直接跳出记忆叙述进行插话，“就现在说来，我同任何一个下等人就似乎有很多方面的话可谈”^③。如此一来，“乡下人”的美好淳朴，被作者无形中放大和凸显。沈从文在“乡下人”身上找到了归属与认同，从而寻找一点支撑下去的自信。

此外，沈从文以自豪和炫耀的口吻叙述自己的家世，并塑造了童年“我”的不凡形象。祖父年纪二十以内“得到满清提督衔”，“二十二岁左右时，便作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又作过贵州总督”，死去时“所留下的一分光荣与一分产业，使他后嗣在本地方占了一个优越的地位”。然后便是引以为傲的父亲，生来就不缺少一个将军的风仪，而对沈从文成长影响更大的母亲，“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较爸爸读的稍多”。“我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她告我认字，告我认识药名，告我决断。”^④沈从文回忆这些时，很明显是为自己的家世深感自豪的。家世在沈从文心灵上刻下的优越感，让他面对城市失衡的心理得到一点满足。沈从文的幼年是在富裕而轻松的家庭环境下度过的，虽然“我”不爱学习、逃课、撒谎、狡猾野蛮、放荡不羁、骂野话，甚至赌博，的确像一个“野孩子”，经常逃学去捉鱼摸虾、游泳打架、偷人家园子里的果子。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分明看出的是一个顽劣、无忧无虑、不爱学习的“小少爷”和“公子”形象。而且作者在追溯当年“我”的时候，凸显了很多“我”的过人之处以及品性的不凡。“初上学时我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少，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故比较

① 沈从文：《常德》，《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

② 沈从文：《怀化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页。

③ 沈从文：《常德》，《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

④ 沈从文：《我的家庭》，《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48—249页。